



海上人家

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

欧阳宗书\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海洋与
中国

丛书



海上人家

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

欧阳宇书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上人家

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

欧阳宗书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上人家

——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

欧阳宗书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 330046 电话: (0791) 8512093 850431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恒达科贸有限公司照排部照排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印刷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9印张 150千字

印数: 1-2000册

定价: 22.80元

ISBN 7-81033-866-8/k·35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 1.8 万余公里的海岸线,1.4 万余公里的岛岸线,沿海岛屿 6500 多个,5 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 300 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国土的 1/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

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顿挫。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视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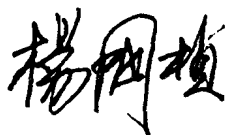
Foot 62

21 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

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植基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

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累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

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分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发凡起例,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造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 21 世纪!



1998 年元旦

致读者

作为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大国，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首先是从渔业开始起步；而中国由海洋迈向世界，则渔民是开路先锋。在中国海洋开发史上，渔业从来都是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在海洋产业经济体系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是将来，渔业经济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明清时代既是中国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形成、发展的时代，又是中外海洋社会经济大碰撞的时代。而在实现这一沧海巨变的历史进程中，海洋渔业经济和数以百万计的耕耘海洋渔业资源的渔民组成的渔民社会起着重要的龙头作用和驱动力作用。因此，以明清海洋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为研究重点，并对它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趋势作一粗线条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清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和渔民社会变迁的发展演变过程的本身，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明清整个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搏及其运作机制，同时还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清时代中国由海洋走向世界及世界通过海洋走向中国的艰难曲折过程。此外，研究这一课题，对于我们今天乃至未来的海洋渔业经济建设及海洋渔政管理，对于促进中国蓝色产业的发展及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同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21世纪被称为海洋世纪。1998年是国际海洋年。在今年召开的九届

人大一次会议上，我国政府已正式将海洋经济确立为 21 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海洋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呼唤着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但愿在导师杨国楨先生的策划、组织、指导下，本书能与其他师兄弟的论著一道，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

对于中国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尤其是明清这一重要的海洋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的综合研究，可谓是学术领域的一片荒地。迄今为止，非但未见有系统专著问世，相关论文亦罕若晨星。检阅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海洋渔业开发相关的研究领域，如中国渔业史、海洋渔业史、历史海洋经济地理、沿海区域经济等的研究，其中虽对明清海洋渔业问题有所涉及，但因学术目标不同，尚未对其时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作综合系统研究。虽然如此，但是因其研究视点已触及到明清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的海洋渔业问题，故此类研究成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学术界关于中国渔业史的研究起步较早。清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沈同芳就编写了《中国渔业历史》¹。书中对中国渔业史的发展轮廓作了粗浅地勾画并介绍了当时各地使用的多种渔船、渔具及沿海某些地区的渔期渔场等。虽然该书对明清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涉之甚少，语焉不详，但是它在学术研究史上的草创之功则是值得肯定的。中国海洋渔业史的拓荒之作当为李士豪的《中国海洋渔业现状

及其建设》²。该书出版于1936年。全书共分六章,分别是:绪论、我国海洋渔业现状、日本在吾国沿海侵渔概况、我国渔民生产组织及其经济概况、我国沿海渔业衰落的原因及我国沿海渔业建设。由于作者关注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海洋渔业的“现状及其建设”,对海洋渔业的历史回顾仅为片言只语,因此,该书对我们研究30年代海洋渔业史作用不小,但对我们研究的中心专题则建树不大。一年之后,李士豪又与屈若皋合著了《中国渔业史》一书³。相对于作者的前一书而言,本书渔业史的学术价值就高得多。全书分为总论、渔政设施、渔业试验与调查、水产教育、渔业技术之进展、新式渔业之沿革及进展、水产贸易、国际渔业交涉与外轮侵渔、渔盐之重要与各省渔盐释放之史实等九章。全书虽然90%的篇幅仍放在30年代渔业之现状上,但毕竟还是有10%左右的内容是探寻渔业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清代以前之我国渔业”、“渔业设施及渔业行政机构之沿革”、“水产技术之演进之各阶段”、“我国渔捞制造养殖之进展”等章节,更具渔业史学术价值。虽然作者是上下五千年式地勾勒中国渔业史的某些方面的发展轮廓,而未专门分历史阶段叙述,显得有些零乱和不成系统,但对于我们考察明清海洋渔业的渊源关系和历史面貌及现代海洋渔业的诞生还是极有裨益的。

建国以后直至80年代初,学术界对于海洋渔业史的研究似不景气。自80年代开始,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热闹起来。1983年张震东和杨金森编著了

《中国海洋渔业简史》⁴。这是建国以来关于我国海洋渔业史的第一部著作，也是目前所见编得最好的一部海洋渔业史方面的著作。全书共分概述、渔政设施、渔民、日本对我国渔业的侵略、传统渔业的渔船渔具、我国机船渔业、水产资源和养殖品种、加工利用及水产教育和试验研究等九章。虽然全书的重点仍在近现代，在体例和内容上承袭李士豪两本书较多，但总的来看，还是将中国海洋渔业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是从海洋渔业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海洋渔业史，更有其学术特色。书中也未对海洋渔业史作分时段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觉得难度较大：“关于编写体例问题有两种考虑：一是像中国通史那样，把海洋渔业发展也分成那几个主要时代；二是采用一些专业史和科技史的方法，分若干专门问题叙述。我们发现，以断代的方法编写海洋渔业史是很困难的。由于封建王朝不重视渔业，渔业政策、生产规模等反映渔业发展水平的史料极少，给编写断代渔业史造成很大困难。另外，有些专门问题也不适宜采用断代的方法，例如水产品的品种、渔船渔具、加工技术等，有些变化很小，断代编写就会有不少重复。”⁵显然，以上述理由解释分时代研究的困难是说不过去的。正因为作者觉得分时代来写难度很大，所以在书中就缺少对明清海洋渔业史作具体地分析和探讨。尽管如此，该书对于我们考察明清海洋渔业的早期开发背景及某些方面（尤其是渔业技术）的渊源演进关系还是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之处。对明清渔业作专章分析探讨的专著当属

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⁶，该书出版于1993年7月。从“编著说明”中可以获知，该书是组织全国渔业史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队伍，经过九年的辛勤劳动才完成的一部著作，因而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渔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史前至中华民国时期，中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5年，下编是古近代名人史要，共计十章；史前时期（公元前21世纪以前）、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秦汉至唐宋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1279年）、元明和清朝初中期（1279～1840年）、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1840～1949年）、恢复、改造时期（1949年10月～1957年12月）、曲折前进时期（1958年1月～1965年12月）、“文化大革命”和挽护时期（1966年1月～1975年12月）、改革发展时期（1976年1月～1985年12月）、台湾省渔业（1945～1985年）。本书的最大突破是将中国渔业发展史分阶段来写。按书中的分法，中国渔业发展史共分六个阶段，即分别为史前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秦汉至唐宋时期（公元前221年～1279年）、元明和清朝初中时期（1279～1840年）、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1840～1949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时期。不过，从全书的篇幅和内容来看，该书仍未摆脱详于今而略于古的窠臼，从史前至1840年的篇幅尚不及全书的四分之一，此其一。其二，全书是将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合而论之，故海洋渔业史的篇幅在全书中所占的份额

就更少。书中将元、明、清三代渔业放在一个大的历史阶段进行论述,虽是学术上的突破,但此种三代合一的分法却有不科学之处,最简单的理由是,元代和明清两代的海洋渔业在诸多重要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别,异性远多于共性。此外,作者认为明清两代海洋渔业的发展是“向下的,倒退的”、“明清两代,南从粤东起,中经福建东山、浙江舟山、江苏连云港,北至山东辽宁间所有海岛,悉数荡平房舍,驱民迁徙”。“这种海禁、迁界暴政,使海洋渔业的生产基本上陷于中断”,“两王朝两次倒退统治,严重地破坏了隋、唐、宋以前的经济基础,致使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现代渔业长期难产”⁷。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代中国渔业史学界对明清海洋渔业发展状况评价的主基调。这种观点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该书,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虽然它从“轻渔禁海、迁界暴政”、“捕捞、养殖、加工的进步和特点”、“渔户、税课、土贡和渔盐管理”、“水产品对外贸易入超”等方面探讨了明清海洋渔业的发展特点,甚至是涉及到了与本书专题相关的渔业生产、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的有关问题,但由于作者都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史学功底先天不足,史证材料极为匮乏,多数情况下不是论从史出,远不如他们做实验严谨,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内容浅显,缺乏研究的深度,更缺乏系统性。仅就“水产品对外贸易入超”而言,本节不足七千字,姑且不说无一则史料证据,而且竟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讲的是光绪年间以后的情况,与作者自己将元明清的历史时期的下限划为1840年就不

相吻合。

关于中国渔业早期开发背景的文章主要有余华青的《秦汉时期的渔业》⁸、魏天安的《宋代渔业概况》⁹、刘汉东的《魏晋南北朝林业、渔业考查》¹⁰、李仲均和李卫的《我国古代的渔业》¹¹等。关于明清时期渔业史的专门文章不多见,笔者检阅有关文献资料,仅见陈伟明先生的《明代的渔业养捕技术》一文¹²。由于文章是从渔业技术的角度来探讨明代的养鱼技术和捕鱼技术,兼之重点篇幅放在淡水渔业方面,故对本专题研究参考价值不大。

区域渔业史研究成果颇伙是中国渔业史研究的又一点。1988年由福建水产学会组织编写的《福建渔业史》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¹³。这本书亦可谓是经过精心准备、多方合作、长期努力而成。为写这本书,编委会早在1984年就开始创办《福建渔业史研究》内部刊物,以征集史料和征求各方面意见,前后共出版8期,该刊亦发表了一些有关福建渔业史研究方面的文章。经过4年准备才正式出版《福建渔业史》。全书分概论、福建渔业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福建渔政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后的福建渔业经济、福建的海洋捕捞业、福建的海水养殖业、福建的淡水渔业、福建水产品加工与供销、福建的渔船、渔业机械和仪器、福建的水产科学技术、福建的水产教育、福建的渔民及其习俗和宗教等十二编,虽然该书的作者都是水产科技专业的专家、学者及渔业公司的一线研究人员,研究重心仍放在现当代,虽然该书离作者所希望的“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几千年来福建

水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尚有些距离，其重心主要放在渔业科技发展史上，虽然该书仍存在自然科学工作者研究史学所犯的史料不足、以偏概全的毛病，但它毕竟“是福建省第一部水产综合专业史文献”¹⁴，在福建渔业史学术研究上的拓荒之功不可磨灭，对于本专题研究也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关于区域渔业史研究方面的文章，赵以忠《舟山渔业发展史初探》¹⁵和吴凤斌的《宋元以来我国渔民对南沙群岛的开发和经营》¹⁶两篇文章值得重视。前文对我国最大的海洋渔场——舟山渔场的渔业自史前至本世纪50年代的发展史作了粗线条地回顾，并对近代舟山渔业衰落的原因作了一些分析和探讨。后文则从渔民在海洋开发中的作用的角度对宋元以来我国渔民对南沙群岛的开发和经营作了可喜的探讨。

一些海洋经济地理及沿海地方史方面的论著，对海洋渔业史也偶有涉猎。如黄公勉、杨金森合著的《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一书就专门有一章谈“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¹⁷。不过，由于该书的作者之一杨金森是《中国海洋渔业简史》的编著者，故书中的观点和体系大多是承袭《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并无多大发展。此外，朱维幹先生的《福建史稿》¹⁸下册第十七章“明代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第四节“渔盐事业的发展”及第二十六章“清代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节“渔业概况”也简略地提到了明清福建海洋渔业发展的一些情况。

台湾学者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史的文章不多见，

而且研究面也比较窄，主要集中在台湾本岛渔业史的研究上。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曹永和先生于70年代初期发表的《明代台湾渔业志略》和《明代台湾渔业志略补说》两篇文章¹⁹。笔者认为，这两篇文章是目前所见有关明清中国海洋渔业区域发展史研究成果中最具学术水平的力作。前文分绪言、初期澎湖渔业、明代之台湾渔业及结语四个小节，对明代台湾渔业作了较深入地研究。文章认为，“有明一代，台湾地区已是闽南渔户的渔场，最先是到澎湖，以后逐渐扩展到台湾本岛。在明代末叶，闽南渔户对于台湾西岸，已非常熟悉”，“台湾区域的渔业，此时已不仅影响闽南沿海居民的生计，而且有关国家的收入。同时，大陆上对于台湾之能够逐渐了解与注意，亦端赖此辈出入风涛的渔户”。“就台湾本身而言，国人发现当时，在经济上本以渔业占优势。在荷兰人入据前后，因台湾处于大陆南洋与日本之间，占地理上的形胜，遂倾向于贸易。嗣后荷兰人提倡土产，适值大陆混乱，有大量移民入台，于是台湾农业的性格，逐渐形成而确定，渔业乃降而为副业。”第二篇文章分引言、明末台湾的渔业、渔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及结论四个部分，循着前文的思路继续探寻“渔业在台湾开发史上的任务”。同前文一样，此文所依据的史料也主要是荷兰人的《巴达维亚城日志》和《大员商馆日志》。文章通过详实地论证，科学地分析，得出六条结论：一、自宋元以来，闽南的渔户不断地扩大其活动范围，不断地寻觅新的渔场，其结果遂来到台湾。二、在明季荷兰人占据台湾以后，汉人的渔业颇

受其保护,故其时台湾的渔业颇为殷盛。三、这很隆盛的渔业,对于荷兰人的财政贡献颇多。四、大陆上来的渔人在渔期中或渔期外,常运用小额的资本兼营商业。五、因为此项渔业活动,故汉人与土著问题逐渐发生关系,一方面又促进盐业的发达,而渔人的定居,并遂开农业的端绪。六、故我人不能不承认在台湾的开发上,是具有着莫大的功绩。这两篇文章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结论上均有许多可取之处,尤其是对于我们研究明代的远洋渔业及渔民在开发海洋中的历史贡献更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关于台湾渔业史研究的成果,《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四《经济志·渔业篇》也值得一提²⁰。书中第一章第四节即为台湾渔业史内容,标题为“早期台湾渔业的起源与发展史”,从“泉漳渔民开拓澎湖台湾渔场”、“荷据时期诱我渔民税”、“明郑清时代渔业成垦民副业”、“日据时期的渔业发展概况”及“台湾光复初期的渔业概况”等五个方面,对台湾渔业发展史作了粗线条地勾勒。

中国渔业史在国外学术界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学术角落。据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民族学研究所 Susanne Brandtstadter, M. A 小姐提供的信息及已故日本好友青山一郎先生提供的相关索引来看,似乎只有日本极少数学者研究这一课题。早期代表性的成果有中村孝志于 50 年代初写的《论台湾南部的鲷鱼渔业》²¹ 和内藤春吉的《台湾渔业史》²²。值得一提的是中村孝志的文章。文章通过以台湾南部的鲷鱼渔业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活动中的一个关节为线